

敦煌文獻圖像整合視閥下的泗州僧伽和尚信仰

鄭阿財

南華大學文學系退休教授暨敦煌學研究中心榮譽主任

摘要

唐代著名高僧僧伽和尚（628-710），本是西域僧人，先至西涼府（甘肅武威），後遊歷江淮諸地，居止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建臨淮寺。屢顯神異，嘗現十一面觀音形，人益信重，世稱觀音化身。中宗景龍二年（708）尊為國師。自此名聲大振。後世有關僧伽大師之神異事蹟，傳說不斷。五代後周世宗令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唐宋以來居士佛教興起，儒、釋、道三教合一之風盛行，流風推動之下，泗州大聖僧伽的信仰圈更快速擴展，今各地仍保有泗州大聖僧伽僧和尚塔、寺、堂、像的遺存，可見證泗州僧伽和尚信仰流傳的時空發展與演變。

本文擬從敦煌文獻 P.3727《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結合 S.1624《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及 S.2565、S.2754、P.2217等《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等相關寫本文獻，關注唐代僧伽和尚信仰的流傳與演變，從交叉學科的視野出發，結合有關泗州大聖僧伽和尚的圖像、經變，援引前輩時賢相關成果，考論敦煌寫本，統整傳世文獻、敦煌石窟壁畫與四川石窟造像等，考察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信仰的發展。

關鍵詞：僧伽和尚、敦煌寫本、石窟壁畫、造像、觀音化身

Image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the Worshipping of Monk Sengqie of Sizhou

Cheng A-Tsai

Retired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nd Honorary Director of
Center of Dunhuang Studies

Abstract

Sengqie (628-710) was a renowned master monk of the Tang dynasty. Originally from Central Asia, he later arrived in the Western Liang prefecture (Wuwei,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traveled through various places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near the Huai River. He then resided in Longxing Temple located in the Chuy Province. Monk Sengqie later founded Liuhuai Temple in Sizhou. He gained a venerated reputation for his repeated supernatural manifestations, including the appearance of the Eleven-faced Avalokiteśvara, and he became referred to by people as the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He became a state preceptor in the 2nd year of Jinlong(708) reign of Tang Emperor Zhongzong, which further catapulted his reputation. Many miracles and legends about Monk Sengqie were passed down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Emperor Chou Shih-Tsung ordered that a portrait of Sengqie must be displayed in all of the Buddhist hermitages built, with the monk honored as “The Great Sage Monk Sengqie”. Lay Buddhism began to gain trac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hree teachings –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began to rise in popularity. Propelled by this trend, the community of worshippers of the Great Sage Monk Sengqie of Sizhou expanded rapidly, and ruins of pagodas, temples, halls, and portraits of Monk Sengqie have been preserved till this day in various places, with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ith the worshipping of Monk Sengqie thereby observed.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focu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bserved with the worshipping of Monk Sengqie by referencing excerpts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including P.3727 (*Karma Stories of The Great Sage Monk Sengqie of Sizhou*); S.1624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Great Sage Tang Monk Sengqie of Sizhou*); and S.2565, S.2754, P.2217 (*Monk Sengqie On the Six Paramitas and Attaining Nirvana*). The development on the worshipping of The Great Sage Monk Sengqie of Sizhou in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is studied through academic cross-examination, with images and paintings based on Buddhist scriptures of Monk Sengqie studied. Moreover, research by other senior scholars, and also Dunhuang Manuscripts, historical literatures, Dunhuang Grotto murals, and rock-cave statues in Sichuan are also integrated in the study.

Keywords: Monk Sengqie, Dunhuang Manuscripts, Grotto murals, Statues, Incarn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壹、前言

宗教信仰人物事蹟的流傳，一般為正史所罕載，六朝以來乃有雜傳，記錄高道傳、名僧傳、高僧傳等一類正史史傳之外的人物事蹟，高僧傳即在其列。此類傳記主要是正史之外，以類相從的傳記集。至於僧傳文學文本主要透過文字記述以供僧眾、信徒閱讀或讚頌講說；晉唐以來，有關高僧傳略、高僧讚、高僧因緣記等僧傳文學，篇幅短小，都是單篇、散錄，既不成集，且未有編纂集錄，其流佈主要在寺院、道場、齋會之間，以寫本傳抄構成，呈現實際應用場合相應的文本特色。而不同文類的文本與圖像文本間，彼此具有共性與殊性，既可互證互釋，又可互補。

這些僧傳文學除了以紙本、石刻等文字記錄的物質文本流傳外，基於廣大受眾，多為一般信眾或不識字，或不便閱讀或無緣閱讀，因而還有以線條、色彩、造型，繪製的圖畫；或是透過傳說、歌謠等口耳相傳在民間廣為傳播，其文本有別於文字載體的物質性，甚至保存在信仰與民俗之間，是流動變異的非物質文本。

本文嘗試以唐代著名高僧僧伽和尚為例，從敦煌文獻 P.3727《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結合 S.1624《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及 S.2565、S.2754、P.2217等《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等相關寫本文獻，關注唐代僧伽和尚信仰的流傳與演變，並從交叉學科的視野出發，結合有關泗州大聖僧伽和尚的圖像、經變，援引前輩時賢相關成果，考論敦煌寫本，統整傳世文獻、敦煌石窟壁畫與四川石窟造像等，考察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信仰的發展。

貳、泗州僧伽和尚信仰與研究發展

一、泗州僧伽和尚及其信仰

僧伽和尚是唐代的著名高僧。綜合唐李邕《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宋李昉編《太平廣記》〈僧伽大師〉、宋贊寧《宋高僧傳》〈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等記載，僧伽和尚本西域僧人，自言蔥嶺北何國（屈霜憐迦）人，因以何為姓。何為唐代昭武九姓之一。龍朔（661-663）初年，先至西涼府（甘肅武威），後遊歷江淮諸地，居止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原安徽省今江蘇泗洪）信義坊得一金像，

上有古香積之銘記及普照王佛之銘，遂建臨淮寺。屢次顯現神異，嘗現十一面觀音形，人益信重，世稱觀音化身。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遂被尊為國師。自此僧伽名聲大振。未久，即入住京師薦福寺，又因治眾病、祈雨有驗，蒙賜「普光王寺」之額於臨淮寺。後示寂於薦福寺，世壽八十有三。中宗深為哀悼，敬漆肉身，送其遺骸還歸本處。弟子惠儼、木叉等為之建塔院。懿宗咸通二年（861）賜號「證聖大師」。

後世有關僧伽大師的神異事蹟，傳說不斷。五代後周世宗令「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¹再者，唐宋以來居士佛教興起，儒、釋、道三教合一之風盛行，流風推動之下，泗州大聖僧伽的信仰圈更快速擴展，流行於江淮、中原、四川、福建之間，甚至普及到全國各省；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敕賜「普照明覺大師」加封「大聖」諡號，後世遂被尊為「大聖菩薩」，又稱「泗州大聖」、「狼山大聖」。

民間有關僧伽和尚神異事蹟的傳說眾多，如「馬郎婦觀音與泗州大聖鬥法」、²「泗州大聖鎖水母」³等，既是促使僧伽信仰中國化、世俗化，推動僧伽信仰發展的動力。又可從前賢考察研究所知，今存各地仍保有眾多有關泗州大聖僧伽僧和尚塔、寺、堂、像的遺存，更可見證泗州僧伽和尚信仰流傳的時空發展與演變。關於僧伽和尚的生平及神異事蹟，北宋贊寧成書於北宋端拱元年（988）的《宋高僧傳》卷18「感通篇」，〈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⁴有詳細的記載。此外，傳世文獻中主要還有唐李邕（678-747）撰於開元二十四年（736）的《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⁵北宋李昉編成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太平廣記》，卷96「異僧」下，也有《僧伽大師》，⁶道原撰《景德傳燈錄》卷27《僧伽和尚傳》⁷也有所記述，在在呈現唐宋僧伽

¹（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18，頁451。

²（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41，「憲宗元和四年」條。CBETA，T49，no.2035，p.0380c13。

³（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卷44，頁320。又元代戲曲家關漢卿曾編有《泗洲大聖鎖水母》雜劇。

⁴（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頁448-452。

⁵（宋）李昉等編，《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858，頁4529。

⁶（宋）李昉等編，《僧伽大師》，《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96，頁638。

⁷（宋）道原撰，《景德傳燈錄》，卷27。CBETA，T51，no.2076，p.433，a4-b10。

和尚信仰的情形。另外，盛唐詩仙李白也撰有《僧伽歌》，⁸因時間有所落差，學者頗以為李白此詩歌詠的僧伽，非指泗州和尚，乃同名異人。

二、泗州僧伽和尚研究的發展

僧伽和尚以一介西域僧人，入華傳法，道行超凡，迭現靈異，遂成高僧，其神異傳說不斷疊加，遂由一方大師晉升為護佑多方的聖者，而為廣大信眾所尊信。其崇奉的階層上自帝王將相，下及平民百姓，且自唐五代以來，歷經宋、元、明各朝，僧伽和尚信仰圈不斷擴大，遍及各省，這是中國佛教史、民間信仰的奇特現象。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大量北宋初期以前的寫本中，也保存了有關僧伽和尚的寫本文獻及北宋時期紙本彩色的僧伽畫像；同時敦煌莫高窟遺存有壁畫的石窟中也發現有五代時期的僧伽畫像，提供研究唐五代到北宋以前僧伽和尚信仰珍貴材料，擴展了僧伽和尚研究的視野。另外，有關各地僧伽寺、塔、堂、像等相關遺跡的發現，也促使相關調查研究的陸續展開，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學界論述漸多。

最早是1957年，牧田諦亮所著之〈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過程泗州大聖僧伽和尚について〉，⁹廣泛的網羅相關傳世文獻，並援引敦煌寫本《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對僧伽信仰進行梳理，開啟了僧伽信仰研究的先河。九〇年代，國人開始從事相關研究，涉及僧伽造像與信仰的相關篇章一時蠡出。特別是2003年江蘇江陰出土泗州大聖舍利的發掘，引起了佛教、藝術、考古、史學等相關學者的關注，紛紛投入相關的調查與研究，陸續發表了系列論著。基於每位研究者學術背景的不同，研究的重點也就各有側重。整體而言，主要圍繞在僧伽和尚生平與信仰，如孫應傑《僧伽生平和僧伽信仰考》；¹⁰或僧伽和尚的圖像研究，如羅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經像與泗

⁸ 安旗主編，「未編年詩」，《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2），頁1678。自宋代以來，頗多主張，如宋董道《廣川書跋》云：「《僧伽傳》，蔣穎叔作，其謂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誤也。詩鄙近，知非太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予為之校其年，始知之。太死在代宗元年（762），上距大足二年壬寅（702）為六十年，而生白。當景龍四年（710），白生九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為出於世俗，而不復考歲月，殆涅其服者托白以為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認定《僧伽歌》為偽作。1987年劉友竹發表《〈僧伽歌〉非偽作辨》從文學角度出發，考證李白《僧伽歌》非偽作。只是李白所歌頌的僧伽不是泗州大聖僧伽，而是另有所指。

⁹ 牧田諦亮，〈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過程泗州大聖僧伽和尚について〉，《東方學報》（1954），冊25，頁264-286。

¹⁰ 孫應傑，〈僧伽生平和僧伽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1期（2017），頁86-93。

州和尚信仰〉、¹¹孫曉崗〈僧伽和尚像及遺書《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有關問題考〉¹²等；隨著僧伽圖像遺存的不斷發現，更多聚焦於泗州和尚三十二化變相圖的研究，如馬世長、姚崇新¹³等，尤其四川地區唐宋石窟的造像，如李小強、鄧啟英《成渝地區中東部僧伽變相初步考察及探略》，¹⁴高秀軍、李向東《新發現資中月仙洞兩龕僧伽變相初考》，¹⁵相關研究情形可參王惠民〈僧伽研究論著目錄〉。¹⁶2017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江蘇省南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共同主辦了「僧伽大師與佛教中國化」學術研討會，發表了近二十篇論文，主要也是集中在僧伽信仰的歷史、僧伽信仰的區域表現及佛教藝術視角下的僧伽信仰等議題。

參、敦煌寫本《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及相關文獻

學界對於泗州大聖僧伽造像與信仰的研究，時段主要集中在宋代及其後的之民間信仰，地域則以四川、江淮、福建為重心。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其抄寫時代為四至十一世紀，據 P32A「敦煌王曹宗壽及夫人施入帙、寫經記」時代最晚為「大宋咸平五年」（1002），而以九世紀中至十一世紀初的歸義軍時期為主。而敦煌莫高窟存有壁畫的石窟據統計有735窟，其時代從十六國時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經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不論寫本或石窟，大抵以唐五代為主。其中也存有與僧伽和尚有關的寫本文獻與壁畫圖像。

¹¹ 羅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經像與泗州和尚信仰〉，《美術研究》，1期（1993），頁64-68。

¹² 孫曉崗，〈僧伽和尚像及遺書《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有關問題考〉，《西北民族研究》，2期（1998），頁261-269。

¹³ 馬世長，〈泗州和尚、三聖像與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圖〉，《藝術史研究》，輯11，（2009），頁273-328；姚崇新，〈四川安岳西禪寺石窟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及相關問題〉，收入姚崇新，《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374-416。

¹⁴ 李小強、鄧啟英，〈成渝地區中東部僧伽變相初步考察及探略〉，《石窟寺研究》，2期（2011），頁237-249。

¹⁵ 高秀軍、李向東，〈新發現資中月仙洞兩龕僧伽變相初考〉，《敦煌研究》，2期（2016），頁46-54。

¹⁶ 王惠民，〈僧伽研究論著目錄〉，《敦煌研究院：敦煌學研究》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149132737013>，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敦煌寫本中，有《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三種有關泗州和尚僧伽的珍貴文獻，抄寫時代為晚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歸義軍時期；莫高窟72窟西壁則保存有五代時期的僧伽像，而法藏敦煌文獻 P.4070則是北宋時期紙本彩色的僧伽像。此外，四川地區也發現有唐代的僧伽石窟造像、摩崖刻石，如安岳縣西禪寺石窟中的僧伽因緣變、潼南縣千佛崖僧伽變相等，提供我們研究唐五代到北宋以前僧伽和尚信仰相關材料，擴展了僧伽和尚研究的視野。

一、敦煌寫本《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

《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為法藏編號 P.3727，此本是有關《付法藏因緣傳》與高僧因緣記、高僧讚匯抄的專輯，由12張大小不一的紙張黏貼而成，從其中合抄有《廣順五年正月都知兵馬使呂富延、陰義進等狀》及《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都知、陰都知狀》，廣德五年即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乙卯，是西元955年，據此可知此本當為十世紀五代時期的寫本。《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是抄寫在第9頁正面，與《寺門首立禪師讚》合抄。背面分抄：《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和尚俗姓史法號增忍以節度使李公度尚書立難刺血書經義》（《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等二篇因緣記。

回顧學界對敦煌文獻中有關僧伽和尚的材料，雖偶有敘及，但實際研究較少，特別是《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的研究相對較晚。1962年，王重民《伯希和劫經錄》著錄 P.3727時僅說：「背錄付法藏傳及其他禪宗史料」，著錄並未提及《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直到2000年，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著錄 P.3727a「付法藏傳及其他禪宗史料」、P.3727b「沙州官吏及僧人來往狀牒數通」其後按語中才提及：在《付法藏傳》行間抄寫、接寫中有《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¹⁷而有關此一文本的整理研究，更要晚到2014年，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¹⁸才有簡單校注。2017年，楊明璋研究僧伽和尚的神異傳說，利用敦煌文

¹⁷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96。

¹⁸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646-648。

獻中三種有關涉及僧伽和尚事蹟的寫本時，則據鍾、張《校注》按核寫本重新檢校、句讀。¹⁹

P.3727《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寫本，首尾俱完，計12行，凡172字。首題：《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內容以僧伽和尚的神異事蹟為主，記敘僧伽和尚擅於變化，人若崇重則獲良緣、除災沴，如邈真觀像則可遂願等「化跡」。統觀P.3727全輯各頁抄寫內容，除主要為《付法藏傳》與高僧因緣記、高僧讚匯抄，其中還有硬筆書寫歷代高僧畫像的壁畫提示稿：「未畫問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 智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 肩長和尚十三代掩耳帽 十四代 十五代前有一僧一俗新樂器 十六代有池內有火 十七代有僧頂上放五色光 十八代有僧說法並有剃度 十九代有樓內有一手放光 又有一僧花山硤身 廿代前有剃度出家」等四行。且還合抄有許多具壁畫榜題套語「聖者……時」、「……時」，如「大迦葉不悟回時，釋迦如來再現大身，相廣為說法，受付囑留傳一代教法時」、「聖者提多迦從尊者付優波鞠多時」、「聖者富那奢從尊者脇比丘受付囑時」、「聖者脇比丘從尊者伏陀密多受付囑時」、「聖者馬鳴菩薩從尊者富那舍受一代教時」、「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彌勒菩薩即為說法時」、「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卻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等，顯然是指示壁畫圖像繪製的榜題文字。

這種匯抄情形，說明了此一文本群蓋以《付法藏傳》為主體，抄錄有關佛陀十大弟子讚或名目，菩薩本生緣及歷代聖者傳等，並結合中國高僧，形成本土佛教的傳法世系，《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記敘唐代僧伽和尚元念神異事跡，既是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壁畫繪製故事情節的文本依據，也是壁畫榜題文字撰寫的參考。茲逐錄全文如下：

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

昔僧伽和尚者，化跡之邦，現身百顧，戈甲莫侵，端然而定，或朝變人相，或夜現佛儀，度昔眾生，令歸彼岸。有人崇重，當獲良緣；若有拒惡，不發恙怒。凡人莫測，數作奇真。因茲誠實，人發勝心，海內清平，殄除災沴。若有修建，繪

¹⁹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期（2017），頁51-76。

聖模真者，無願不遂，更有靈應別錄傳文。奉勸至心敬禮。渴仰聖者，求願滿足，隨願現種種身，或示大身，側塞遍滿虛空；變小身，猶如微塵，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論、不可說。大慈大悲誌公和尚真影。

張僧繇邈此和尚真影時。

此篇全文169字，主要記敘僧伽和尚現身百顛、戈甲莫侵，並形容僧伽和尚能百變，時而為人相，時而現佛面，或示大身，或變小身，若人對其崇重，則可獲良緣、除災沴，世人若能「繪聖模真」，則可「無願不遂」。

首題：《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明確的稱泗州僧伽和尚為「聖者」，這在僧伽和尚佛教信仰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義。這與莫高窟第72窟西壁龕外南側上畫聖者泗州和尚，榜題明白標示「聖者泗州（州）和尚」以及，同一窟龕外北側相對畫有「聖者劉薩訶像」，榜題也是標示「聖者劉薩訶」。顯示此具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獨特意涵。按：史傳所載僧伽和尚於唐景龍二年被尊為國師，八十三歲示寂，懿宗咸通二年，賜號「證聖大師」，五代時後周世宗曾下令「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²⁰這是帝王的尊崇，然在敦煌佛教的信仰中顯然將其與佛圖澄、劉薩訶、淨影寺惠遠等視為《付法藏因緣傳》西天佛祖聖者在中土的延續與傳承。

又《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省略僧伽和尚的生平、經歷，而集中強調僧伽和尚的神異表現；「現身百顛，戈甲莫侵，朝變人相，或夜現佛儀」、「隨願現種種身，或示大身，或變小身」旨在展示僧伽觀音化身的，「有人崇重，當獲良緣，人發勝心，殄除災沴」則在傳達僧伽具消災解厄，有求必應的信仰功能。奉勸信眾修建僧伽塔院、堂等，造像、模真、寫影，至心敬禮。對於僧伽信仰的傳播具有積極的宣傳作用。

至於文末提及「大慈大悲誌公和尚真影。張僧繇邈此和尚真影時。」等，顯然不是《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的本文。但是我們若結合 S.1624《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唐虢州萬迴和尚傳（鈔）》、《三寶感通錄·宋寶誌傳（鈔）》的匯抄，以及敦煌石窟出現有僧伽、寶誌、萬迴的畫像與資料。還有四川夾江千佛崖第91號窟刻有僧伽、萬迴、寶誌三高僧合龕像，乃至大足北山佛灣177窟北宋時的僧伽、

²⁰（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頁451。

萬迴、寶志三高僧合龕像等等來思考，可以想見 P.3727 匯抄許多高僧畫像榜題文字稿，「大慈大悲誌公和尚真影」是提示「誌公和尚真影」的繪製，「……時」為壁畫變相榜題套語，「張僧繇邈此和尚真影時」無疑是誌公和尚變相畫的榜題。據此還可推測《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可能是僧伽和尚因緣變相的文本依據，也是榜題文字稿的參考。

二、敦煌寫本《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

敦煌文獻中有關僧伽信仰的資料，除了 P.3727《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記》外，還有英藏 S.1624《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S.1624 為卷子本，長 89.5 公分，高 30.5 公分，首尾俱殘，存三紙。正背書。正面為天福七年（942）《大乘寺常住什物點檢歷》存 46 行。背面分抄：《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8 行、《唐虢州萬迴和尚傳》（鈔）13 行、《三寶感應錄·宋寶誌傳》（鈔）14 行。按核原卷，卷背與 S.1625 卷背《佛圖澄因緣記》、《隋大興寺釋智興鳴鐘感應記》及 S.1774 卷背《寺門首立禪師頌》筆跡相同，當係出自同一人所抄；屬同一主題的文本群。均是記敘高僧靈應、感通事蹟。

詳審 S.1624 所抄之文本，其內容記敘高僧事蹟並不完整，當是摘錄抄略。其中抄錄的「謹按：《泗州僧伽大師實錄》」9 行，與李邕「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內容相較，顯得簡要，顯然是實錄的摘鈔本。基於抄錄性質，其內容明顯側重在僧伽和尚顯現的神異事蹟。同一寫卷匯抄的其他二則：「謹按〈傳記〉唐中宗皇帝時萬迴和尚」、「謹按《三寶感通錄》宋末沙門寶志」，其摘鈔的內容也是聚焦在有關萬迴與寶誌的靈應事蹟。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著錄此卷時云：

此件由斯一六二四正面和斯一七七六（2）背拼接而成，其內容為僧傳摘抄，有惠能禪師、僧伽大師、萬迴和尚、張僧謠（繇）和沙門寶志等。所抄惠能禪師的有關文字與《歷代法寶記》相關記載大致相同，但只抄寫了其前半部分。僧伽大師和萬迴和尚的事蹟，抄者稱抄自「實錄」和「傳記」，其內容與《宋高僧傳》不同，且都是只抄了這兩位僧人生平的一部分。卷末有濃筆大字書寫的「感通」二字，至少自僧伽大師以後，所抄寫的多是有關「感通」的內容。²¹

²¹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卷7，頁375。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S.1624《唐泗州僧伽大師傳疏》：本篇由三個「謹按」引述的內容構成：「謹按《唐泗州僧伽大師寔（實）錄》」、「謹按《傳記》」、「謹按《三寶感通錄》」，實際主要是兩則「謹按」，後一則僅殘有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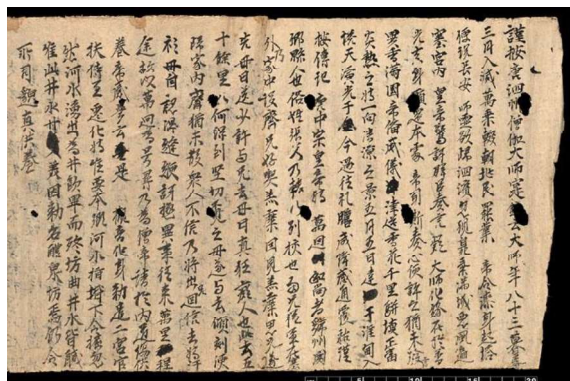


圖1 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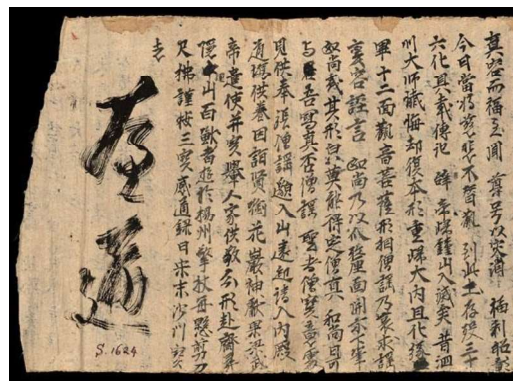


圖2 3022

按：S.1624第1行到第8行為第一主題，記敘僧伽和尚行蹟，是據《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摘鈔；第8行到21行為第二主題，記敘萬迴和尚行蹟，是據《傳記》摘鈔；第22到35行為第三主題，記敘寶誌和尚行蹟，是據《三寶感通錄·宋寶誌傳鈔》摘鈔。其中第三部分寶誌和尚行蹟的記述，時賢有依寫本行款先後順序逐錄釋讀，如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²²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²³然因底本抄寫本身的問題，致使依序釋讀文字多不銜接，語序又多混亂，難以卒讀。

對此，方廣錫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書》條記目錄著錄01624號時有云：「本遺書原抄《天福七年（942）大乘寺常住什物點檢歷》（擬），其後作廢，有人利用其背面空白抄寫《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擬）、《唐虢州萬迴和尚傳鈔》（擬）、《三寶感應錄·宋寶誌傳鈔》（擬）等三個有關高僧行狀的文獻。正背面文獻從內容看無邏輯關係，背面三個文獻為同一主題，但抄自不同來源。」又於著錄斯01624號背3《三寶感應錄·宋寶誌傳鈔（擬）》時進一步說明云：「本文獻所據底本的文字共15行，係從左向右排列。抄寫者未注意底本的這一書寫特點。按照從右向左的慣例抄寫

²²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頁374-375。

²³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頁617。

文字，且抄寫時未顧及底本之原行款，將底本的15行文字抄為14行，故使全文爪散，難以卒讀。今錄文按照文意重新整理組織文字，並恢復該文獻所據底本之行款。」²⁴

按：莫高窟97窟東、南、北三壁十六羅漢圖，王惠民以為很可能是依據前蜀武成年（908-910）期間以畫羅漢而聲名顯赫的張玄《十六羅漢圖》而繪製。²⁵現存十一身。每一畫像上均有榜題，每條榜題前半部分是羅漢簡介，內容出自唐玄奘譯《大阿羅漢難提蜜多羅所說法住記》，後半部分為七言讚頌，共八句。與97敦煌寫本S.1589V、P.3504、BD07650V（皇字50V）、BD08227V（服字27V）《十六羅漢頌鈔》（擬）文字內容相同。其榜題文字也是自上而下，由左而右書寫的。如南壁第九尊者戍博迦（圖3）。



圖3 莫高窟97窟 南壁 榜題戍博迦羅漢。

慈悲不替賜提攜 永捨喧煩生死路
我今發露依歸願 眾會咸生虔仰心
勅諸羅漢住諸方 化苦眾生超苦海
佛為四弘悲願力 臨滅猶哀救世人
世間 作大利益 頌曰
等 敬奉 佛勅不入涅槃久住
阿羅漢自與眷屬九百阿羅漢
香醉山中第九尊者戍博迦大

榜題文字內容，當作依序讀作：「香醉山中第九尊者戍博迦，大阿羅漢自與眷屬九百阿羅漢等，敬奉佛勅，不入涅槃，久住世間，作大利益。頌曰：佛為四弘悲願力，臨滅猶哀救世人；勅諸羅漢住諸方，化苦眾生超苦海。我今發露依歸願，眾會咸生虔仰心；慈悲不替賜提攜，永捨喧煩生死路。」足可作為佐證。

²⁴ 楊明璋討論 S.1624時採方廣錫之說，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頁54-55。

²⁵ 王惠民，〈敦煌壁畫〈十六羅漢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1期（1993），頁25-36。

衡以寫卷抄寫現象，並詳審全文語意文字脈絡，個人以為方氏說法合理可取。茲據原卷，參考諸家釋錄，錄文如下：

謹按〈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云：大師年八十三，暮春三月入滅。萬乘輟朝，兆民罷業。帝令漆身起塔，便設長安。師靈欲歸泗濱，忽現臭氣滿城，惡風遍塞宮內。皇帝驚訝，群臣奏言，疑大師化緣在於普光寺，身願還本處。帝聞斯奏，心便許之。猶未發言，異香滿國。帝備威儀，津送香花，千里駢填。正當炎熱之時，一向清源之景，五月五日達於淮甸。入塔，天演光於今。過往禮瞻，咸降感通覆祐。

謹按〈傳記〉：唐中宗皇帝時，萬迴和尚者，號州閬鄉縣人也。俗姓張，父乃轅門別校也。時兄從軍在塞外，乃家中設齋，兄好喫饅糜，因見饅糜思兄，遂先母曰：「送少許與兄去。」母曰：「真癡狂人也，此去五千餘里，如何得到？」堅切覓之，母遂與去，頃刻便歸，家內齋猶未散。眾人不信，乃將出兄回信去時汗衫，母自認得縫縵，訝極異事，徒來萬里程途，故以萬迴為號。尋乃為僧，帝請於內道場供養。帝感夢，云是觀音化身，敕遣二宮官扶侍。至遷化時，唯要鄉河水，指堦下令掘，忽然河水湧出為井，飲畢而終。坊曲井水皆鹹，唯此井水甘美，因敕名醴泉坊焉，仍令所司邈真供養。

謹按《三寶感通錄》曰：宋末沙門寶誌者，遊於揚州。擎杖每懸剪刀、尺紉。人家供敬，分形赴齋。尋隱鍾山，百獸銜花，巖神獻果。梁武帝遣使並寶輦，入山遠迎，請入內殿道場供養。因詣賢聖者僧寶意處，見供奉張僧繇邈真，和尚曰：「可與吾寫真否？」僧繇下筆。和尚惑其形貌，莫能得定。僧繇變容，徑言：「和尚！」乃以爪撚面，開示十二面觀音菩薩形相。僧繇乃哀求、懺悔，卻復本形，重歸大內。且化緣畢，辭帝，歸鍾山入滅矣。昔泗州大師到此土存歿，三十六化，具載《傳記》，福利昭彰。今日當時，慈悲不替。觀真容而福至，聞尊號以災消。

「謹按《唐泗州僧伽大師寔（實）錄》」、「謹按《傳記》」、「謹按《三寶感通錄》」，說明本篇蓋由三段以「謹按」作為開頭的引述內容構成。「謹按」是引用

論據、史實開端的常用語；是摘引《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傳記》、《三寶感通錄》以作為傳記的補充注釋性文字。²⁶

考謹按又作謹案，意謂審慎查考。在作為引用論據、史實開端的常用語時，之後每每緊接著引據經典文獻，如《唐會要》卷17：「祭器議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等。……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敦煌文獻中以「謹按」、「謹案」作為引經據典論述的開頭，時有所見。如英藏 S.3092道明和尚故事的記敘，原卷開頭也是以：「謹案《還魂記》」。既是引據，自然多節引摘錄，並非引據完整全文。詳審 S.1624號全文，可確知其內容是引據典籍史傳的節錄摘抄無疑。

以上三段謹按的文字內容，第一段136字，記敘僧伽和尚事蹟；第二段213字，記述萬迴和尚事蹟；第三段200字，主要記述寶誌指爪楞面，顯示十二面觀音形相，使畫師張僧繇無從下筆寫真一事，並記敘同為觀音化身的僧伽和尚，謂其能三十六化，信眾得以觀真容而福至，聞尊號以災消。

關於《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宋贊寧《宋高僧傳》卷18〈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中有載「先是此寺先因竊中金像刻其佛曰普照王，乃以為寺額。後避天后御名，以光字代之。因近宣索《僧伽實錄》，上覽已，敕還其題額曰普照王寺矣。」²⁷足見北宋時《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尚存，唯今已失傳，其內容遂不得其詳。

三段記敘均以神異傳說為核心。雖均以「謹按」開頭，說明下為引據經典，然所明白標示援引之《唐泗州僧伽大師實錄》、《傳記》、《三寶感通錄》內容，遍尋原典均不可得。其中有關寶誌的敘事與道宣撰《集神州三寶感通錄》有部分近似，是謹按並非忠實引文。然S.1624僧伽、萬迴、寶誌合抄同一卷面，僧伽三十六化相、寶誌以爪楞面十二面觀音菩薩相等，均見載於《宋高僧傳·萬迴傳》中。又四川省安岳西禪寺石窟1號龕唐元和十三年（818）僧伽和尚三十二化因緣變相龕，雖主像已遭毀損，然此窟有三尊主像，應該是僧伽、寶誌、萬迴三僧窟；潼南縣千佛崖殘存有唐代

²⁶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頁617。

²⁷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頁452。

僧伽變相10組；大足北山佛灣177窟、夾江千佛崖91龕，均有唐末五代刻的僧伽、萬迴、寶志三僧合龕像，說明此一現象非偶然，其間關係有待進一步探究。

三、敦煌寫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

敦煌寫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一般根據《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著錄，以為共有四個寫卷，如孫曉崗〈僧伽和尚像及遺書《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有關問題考〉、²⁸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²⁹等，指的是：S.2565、S.2754、P.2217、散1563等。

事實上，敦煌寫本《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總計只有 S.2565、S.2754、P.2217等三件寫本。其所謂的散1563，實際指的是《大正新脩大藏經》第85冊古逸部、疑似部 N0.2920《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其錄文係根據 S.2754為底本，加以校錄排印。實質上並無所謂的第四種本子，詳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85冊校記，³⁰及矢吹慶輝《鳴沙遺韻解說》。³¹

S.2565卷子本，存5紙，長144.7公分，高25.4公分。為九至十世紀歸義軍時期的寫本。正背書寫。正面計84行，行約18字。分別抄寫：《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受十齋戒經》、《大乘莊嚴經論》、《菩薩瓔珞經》；背面抄有：《金剛經纂》、《十齋日》、《劉師禮文》。《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首完尾缺，存17行。首題：《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起「吾告於閻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迄「遂入涅槃。舍利本骨」（以下未抄）。

S.2754，卷子本，存2紙。長91.8公分，高25.3公分。是八至九世紀吐蕃時期的寫本。計42行，行17字。首尾俱完。首題：《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起「吾告

²⁸ 孫曉崗，〈僧伽和尚像及遺書《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有關問題考〉，《西北民族研究》，2期（1998），頁262。「此經在敦煌遺書中，共有四個卷號，分別為伯2217、斯2556、斯2754、散1563。」

²⁹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期（2017），頁52。「此經為疑偽經，據稱有 S.2565、S.2754、P.2217、散1563等四個寫本，惟散1563一本，筆者尚未尋見。」

³⁰ 《大正新脩大藏經》，85冊，頁1463。<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sutra/chinese/index.jsp>，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³¹ 矢吹慶輝，《鳴沙遺韻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33），第一部，頁195。

於閻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迄「唵跋勒攝娑婆訶」。尾題：「僧伽和尚經」。後有署名「恩會」。文中「愍」字缺筆避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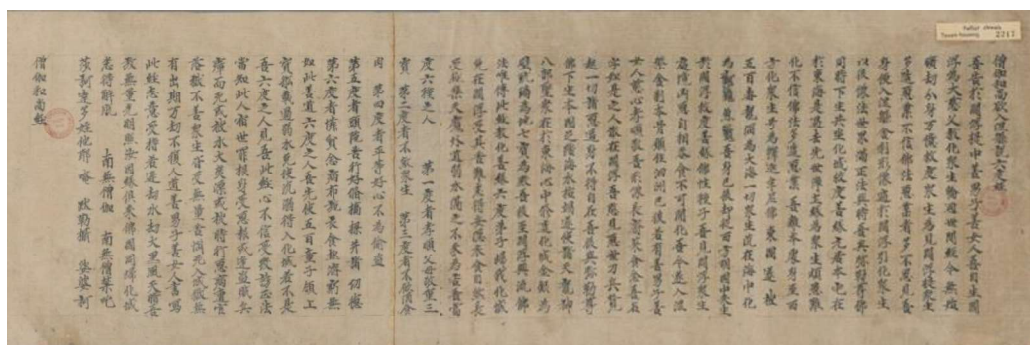


圖4 《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96.3×25.6cm，法藏 P.2217。

P.2217，卷子本，存2紙。長96.3公分，高25.5或25.6公分。計42行，行15至18字。首尾俱完。首題：《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起「吾告於閻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迄「唵跋勒攝娑婆訶」。尾題：「僧伽和尚經」。

茲以 P.2217為底本，參校 S.2754、S.S.2565。錄文如下：

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

吾告於閻浮提中善男子善女人：吾自生閻浮，為大慈父，教化眾生，輪迴世間，經今無始曠劫，分身萬億，救度眾生。為見閻浮提眾生，多造惡業，不信佛法，惡業者多，吾不忍見，吾身便入涅槃，舍利形像遍於閻浮，引化眾生，以後像法世界滿正法興時，吾與彌勒尊佛同時下生，共坐化城，救度善緣。元居本宅，在於東海，是過去先世淨土緣，為眾生頑愚難化，不信佛法，多造惡業，吾離本處，身至西方，教化眾生，號為釋迦牟尼佛。東國遂被五百毒龍，陷為大海，一切眾生沈在海中，化為鼃黿魚鼃。吾身已後，卻從西方胡國中來生於閻浮，救度善緣，佛性種子。吾見閻浮眾生，遍境凶惡，自相吞食，不可開化，吾今遂入涅槃。舍利本骨願住泗州，已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慈心孝順，敬吾形像，長齋菜食，念吾名字，如是之人散在閻浮，吾潛見惡世刀兵競起，一切諸惡逼身，不得自在。吾後與彌勒尊佛下生本國，足踏海，水枯竭，遂使諸天龍神八部聖眾在於東海中心，修造化城，金銀為壁，琉璃為地，七寶為殿。吾後至閻浮，與流佛法，唯傳此經，教化善緣，六度弟子歸我化城，免在閻浮受其苦難，悉得安穩，衣食自然，長受極樂，天魔外道，弱水隔之，不來為害。吾當度六種之人：第一

度者，孝順父母，敬重三寶；第二度者，不殺眾生；第三度者，不飲酒食肉；第四度者，平等好心，不為偷盜；第五度者，頭陀苦行，好修橋梁，並諸功德；第六度者，憐貧念病，佈施衣食，拯濟窮無。如此善道六度之人，吾先使百童子領上寶船，載過弱水，免使沈溺，得入化城。若不是吾六度之人，見吾此經，心不信受，毀謗正法，當知此人宿世罪根，身受惡報，或逢盜賊兵瘴而死，或被水火焚漂，或被時行惡病，遭官落獄，不善眾生皆受無量苦惱，死入地獄，無有出期，萬劫不復人道。善男子善女人，書寫此經，志意受持，若逢劫水劫火，黑風天暗，吾放無量光明照汝，因緣俱來佛國，同歸化城，悉得解脫。

南無僧伽南無僧禁吒莎訶達多姪他耶唵跋勒攝娑婆訶

僧伽和尚經

這篇偽經的具體創作年代難以考證，但可據寫本紙張行款、字體、避諱字及整體風格來推測寫本的抄寫時代。楊明璋據 S.2754「僧伽和尚經」寫本尾題「僧伽和尚經」後有「恩會」二字，以為是活動於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的僧人恩會所抄，是此卷抄寫時代為歸義軍後期，進一步推論撰造年代應不晚於太平興國九年（984）。³²

詳審全經內容，係以僧伽和尚本人自述的口吻，聲稱自己輪迴世間無數劫，是觀音化身，前來東土教化眾生，因閻浮提眾生多作惡業，不信佛法，故今欲涅槃。待日後與彌勒同時下生，救度善緣。經中自稱本居於東海，後離本處至西方教化眾生，被稱做釋迦牟尼佛。又從西方胡國來生於閻浮提，為涅槃後舍利願安放於泗州。

《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歷代經錄不錄，藏經不載，當是僧伽和尚信仰盛行後所撰造。佛教所謂的「六度」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是大乘佛教中菩薩欲成佛的六種德目。《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中所謂的「六度」，則是指僧伽今後欲救度的六種人。即：第一度者，孝順父母敬重三寶；第二度

³²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頁58：「尾題『僧伽和尚經』之隔行，書寫有『恩會』二字，應是人名，甚至就是抄寫者，經查索土肥義和編《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一書，發現『恩會』確實為人名，是活動於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的僧人，敦煌文獻中書有『恩會』的寫本，除 S.2754之外，還有包括：P.3240的『壬寅年（1002）六月廿一日配經歷』中有『恩會法律』、『壬寅年（1002）七月十六日付昏歷』中有『恩會法律』，S.4117『寫經人校字人名目』中有『壬寅年（1002）三月廿九日』及『恩會法律』，S.6946V 雜抄則有『恩會』二字及『太平興國九年六月立契莫高鄉百姓押衙陰丑捷』。這些時間和牧田氏引述的《淮系年表》所記錄淮水氾濫時間相當，而一部與淮水流域水患密切相關而撰造的經典，要流布至敦煌並成為敦煌僧侶傳抄念誦的對象，恐怕也需要一些時日，故《僧伽和尚經》的撰造應不會晚於太平興國九年。」

者，不殺眾生；第三度者，不飲酒食肉；第四度者，平等好心；第五度者，頭陀苦行，好修橋樑，並諸功德；第六度者，憐貧念病，佈施衣食，拯濟窮無。並將這六種人接度到所設的佛國。經文內容主要記敘僧伽和尚與水災有關的神異救度敘事，經中將僧伽形塑成眾生逢劫難的救世主，尤其是水、火、風三災之一的水災之救濟。牧田諦亮則以為此經的撰造與泗州為中心的淮水流域水患有關，並引《淮系年表》中記載開寶七年（974）、咸平四年（1001）淮水氾濫成災，論此疑偽經大概成立於北宋初期。經文中呈現儒佛雜揉，儒佛會通。展現了佛教中國化積極而具體的作為，推動了唐宋居士佛教的大幅發展。是研究民間宗教的珍貴資料。

肆、傳世文獻文本呈現的僧伽和尚事蹟

現存有關僧伽傳記資料最古老的當推唐李邕撰於開元二十四年的《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李邕字太和，江夏咸寧（今湖北咸寧市）人，曾任北海太守，故人稱李北海，是唐代文選學大家李善的兒子，著名的行書碑法大家。書法風格奇偉倜儻，《宣和書譜》說：「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學右將軍行法，既得其妙，乃復擺脫舊習，筆力一新。」傳世碑刻甚多，如著名的《麓山寺碑》、《李思訓碑》等。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全文見錄於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858。³³李邕所撰此碑文係以史傳形式表述僧伽和尚生前行跡，如實的記敘了僧伽和尚從西域何國，東來中土，致力於化導眾生。初至臨淮，發心建寺，救助苦難民眾。寺院以普照王佛為本尊，「光相才現，瞻仰已多，遠近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之後，如何從江淮地方的民間信奉，發展到中宗皇帝的尊崇，詔入內殿說法，並賜予本尊佛號匾額。景龍四年（710）僧伽示寂，「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漆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七僧，賜絹三百匹。敕有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日還至本處。」弟子惠嚴、道堅、木叉等建起崇塔院等等。

³³ （宋）李昉等編，《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文苑英華》，卷858，《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1冊，集部280，頁451-453。

較之其他有關僧伽的文獻記載，碑文最大的特點在於不涉神異傳說；是傳世文獻中有關僧伽傳記極為平實中肯的史傳材料。後世各種有關僧伽和尚傳記記敘大抵以此為基本架構，只是隨著僧伽信仰的發展，後世的相關記敘，逐漸將重心集中在僧伽和尚的種種神異事蹟與靈驗傳說。

另外，《太平廣記》、《宋高僧傳》也是根據唐代相關資料加以記述的主要史傳文獻，茲略加論述如下。

《太平廣記》是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李昉等主編成書的，其卷96《異僧》下有《僧伽大師傳》。³⁴這篇有關僧伽事蹟的記述，相較於李北海《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接近史實的描述，更增添了不少有關僧伽和尚神異功能與傳說。

諸如僧伽「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濯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京畿無雨，已是數月……。師乃將瓶水泛灑，俄頃，陰雲驟起，甘雨大降。」「長安薦福寺端坐而終。中宗即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風歛起，臭氣遍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鬱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等，其中還提及中宗問萬迴師僧伽大師何人？萬迴回答說：「是觀音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云：應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即是也。」這是傳世文獻中有關僧伽為觀音化身的最早記載。至於其他記述僧伽和尚的生平事蹟，《僧伽大師傳》基本上多承襲碑文的記述。

《宋高僧傳》是北宋贊寧於端拱元年編撰完成的，其《感通篇》中立有〈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³⁵內容涵蓋僧伽和尚的生平行狀以及其神異、靈驗事蹟。此篇記敘對於僧伽生前的經歷雖然未脫邕碑文的框架，然相較於碑文及《太平廣記》、《僧伽大師傳》的記載，突顯的是篇幅廣大，記載內容全面，是有關僧伽生平事蹟記敘最為詳細且具代表性的文本。

此外，另一鮮明的特點是贊寧敘述加重僧伽和尚示寂之後，所出現的靈驗感通事蹟，涉及事件的人物也較為多元，身份從皇帝、官員、文士到平民、百姓，商人、漁

³⁴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638。

³⁵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頁448-452。

民、船夫、善信、僧尼；同時對於僧伽以十一面觀音的形象示現，在水難、盜賊、疾病、旱災、兵難等各方面所展現的種種神異事蹟，記敘著墨尤多，可說將僧伽和尚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的靈異事跡一一網羅。

如「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舍宅焉。」「帝慘悼黯然。於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勅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可說是僧伽和尚在唐代靈異事跡的集大成，這種當是贊寧迎合當時社會供奉僧侶、禮敬佛法的流行做法，及重視感通事蹟的形式。其將僧伽和尚作為觀音化身的宣傳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有效而成功的傳播，關係著泗州僧伽和尚信仰在宋代的盛行與發展。

伍、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的圖像

一、敦煌莫高窟僧伽和尚造像

僧伽和尚初唐時經由河西而入中原，成名於泗州，流傳於江淮，其後信仰又回流西傳至敦煌，今所得見敦煌寫本中有《泗州僧伽和尚因緣記》、《泗州僧伽和尚實錄鈔》、《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說六度經》等相關文獻，S.4474《文樣》《慶蘭若》有：「敬造瓦堂一所，塑僧伽和尚一軀」可見塑僧伽和尚像已是敦煌當地佛教流行的事情。敦煌莫高窟的圖像資料中，也有關於僧伽和尚的圖像，既有莫高窟晚唐五代72窟西壁的僧伽像（圖5），又有法國巴黎藏 P.4070北宋紙本彩繪的僧伽像（圖6）。

略述如下：圖5莫高窟72窟西壁龕帳門外南側上端，畫一高僧，頭戴菩薩冠（殘）、身著水雲袈裟，雙手置於腹前，作禪修狀，結跏趺坐於深山精廬之中。畫面右側有長條榜題，作：「聖者泗洲（州）和尚」。又畫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請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入塔赴那吒會一鋪，中為普賢菩薩變，下模糊。

龕帳門外北側上端，畫聖者劉薩訶和尚像及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請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入塔赴那吒會一鋪，中為文殊菩薩變，下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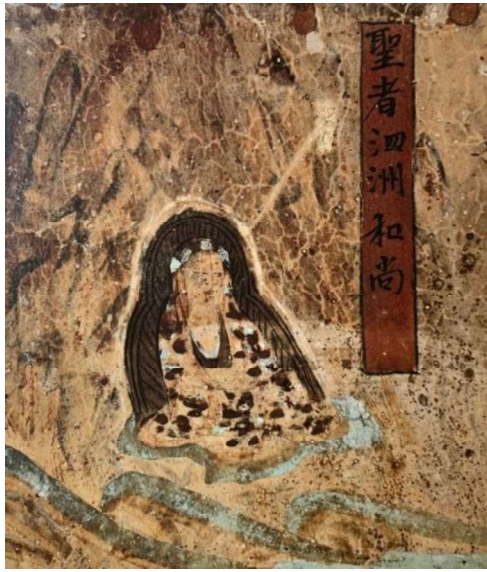


圖5 晚唐五代，莫高窟72窟西壁僧伽像。



圖6 北宋，〈僧伽畫像〉
(P.4070V)，彩色紙
本，80.4×33.8cm，法國
國家圖書館藏。

此窟72窟為張氏歸義軍初期開鑿，約晚唐五代。關於此畫像繪製的年代，有主張為晚唐作品，宋代部分補色。由於五代末期周世宗柴榮於顯德四年（957）取泗州之後，曾詔命「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像，榜曰：大聖僧伽和尚。」³⁶因此，有學者據此以為此像為五代所繪製，是現存有明確榜題的僧伽和尚畫像中，屬年代較早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72窟西壁龕外南側上畫聖者泗州和尚、毗沙門天王赴那吒會，中普賢變，下模糊。榜題明白標示「聖者泗洲（州）和尚」相對的龕外側上也畫有「聖者劉薩訶像」。同一窟內有聖者劉薩訶和尚像與聖者泗州和尚像兩位神僧的單幅畫像相對，現存僅此一例，意義特殊，且二者同樣在敦煌文獻中均有因緣記的存在，顯示敦煌地區佛教信仰的獨特意涵。

按：《高僧因緣記》主要記敘高僧出家學佛的因，修行得道成為高僧的緣。敦煌寫本 P.2680、P.3727、P.3355所抄錄的內容以《付法藏因緣傳》為主體，且將十大弟子讚或名目、菩薩本生緣、歷代傳法聖者傳、《佛圖澄因緣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等匯抄一起，顯示出敦煌當地將中土高僧列入歷代祖

³⁶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傳（木叉、慧儼、慧岸）〉，頁451。

師、聖者之列，並繪製畫像。高僧因緣記即是壁畫繪製的文本依據，也是榜題擬撰的參考。

圖6畫中所繪外框是一個盃頂型龕，上有垂幔、帷帳；中繪僧伽像，頭戴風帽，身著交領袈裟，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於椅榻上；背後繪有雙娑羅雙，左右各有一立侍者，頭梳雙髻，右者右手執淨瓶、左手持柳枝；左者右手握拳，左手執扶塵，即一般高僧服侍左右的近事者。椅榻前右側男性供養人胡跪於毯上，面向僧伽禮敬；供養者身後繪有一侍女；榻前左側有雙鹿。

佛教從印度到西域經絲路而東傳，佛陀、佛弟子、菩薩到高僧成為佛教發展的網絡，晉唐高僧崇拜興起，由西域入華高僧漸次發展，受《付法藏因緣傳》西天祖師聖者世系之影響，到中土高僧，神異感通高僧，逐漸接續西天祖師聖者，成為中土信眾敬崇禮拜的對象，甚而撰作高僧因緣記、繪製高僧圖像，尤其中土高僧中出身或弘傳過程中與河西敦煌有著密切地緣關係的劉薩訶、淨影寺惠遠、僧伽和尚等在敦煌石窟與文獻的展現，實為自然的發展。

二、四川地區僧伽和尚造像與經變

八〇年代以來有關僧伽和尚造像的研究隨著佛教考古的發現，論著篇章漸多。其中鄭式〈佛裝與佛化——中古時期泗州僧伽信仰與圖像的在地化〉³⁷是較為全面而有系統的梳理研究，主要以宋以後及四川地區為調查為主要對象，宋以前相對較少。

按：今已發現最早的僧伽造像是元和十三年四川安岳石窟西禪寺中的三十二化僧伽和尚龕像。³⁸此後，僧伽的形象常見於石窟寺、佛寺、佛塔甚至墓室壁畫等，身份包括高僧、神僧以及觀音化身等。目前，可移動的單體僧像，以閩浙蘇滬一帶佛塔出土的為主。

四川省安岳西禪寺石窟1號龕唐元和十三年僧伽和尚三十二化因緣變相龕，此窟有三尊主像，應該是僧伽、寶志、萬迴三僧窟，但主像均已遭毀損。造像題記有兩側，一處位於龕眉正中，左行真書「泗州僧伽和尚」，另一位於開口左側壁，主要鐫刻功

³⁷ 鄭式，〈佛裝與佛化——中古時期泗州僧伽信仰與圖像的在地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2016），頁71-97。

³⁸ 馬世長，〈泗州和尚、三聖像與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圖〉，頁273-328；姚崇新，〈四川安岳西禪寺石窟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及相關問題〉，頁374-416。

德主姓名。據此題記，該龕開鑿於唐憲宗元和十三年，首題：「敬造卅二化僧伽和尚龕□（後闕）」。主像後壁雕刻僧伽因緣變相圖非常罕見。³⁹

又四川省夾江縣千佛岩第091號窟刻有僧伽、萬迴、寶志三高僧合龕像（圖7）。全龕共計有五尊像，正尊三尊均戴帷帽，為僧伽、萬迴、寶志。正壁為僧伽及脇侍二弟子，一人雙手合十於胸前，另一位右手持灌瓶。左壁為寶志，右壁是萬迴。僧伽像所處為主尊的位置，手持禪定印，結跏趺坐；寶志、萬迴一左一右，所處位置屬配祀的位置。此種組合關係，顯示泗州僧伽和尚是本窟奉祀的主尊，並預示為後來稱為泗州佛的發展。窟門口另有兩尊造像，一尊嚴重風化，已不可辨識，另一尊為俗家造像，時代被定為唐末至五代。⁴⁰此窟共有造像七尊，主尊為僧侶坐像，頭部已殘缺，但仍然可以看出披在肩上的風帽垂帶，當為僧伽像。僧伽左側亦是一位戴風帽的僧侶，左手持錫杖，上掛剪刀、直角尺等，當是寶志和尚的形象。僧伽右側為萬迴像作沙門形，身穿翻領袍服，雙目呆滯，張口未合，表情木訥。



圖7 四川夾江縣千佛岩 D 區第091號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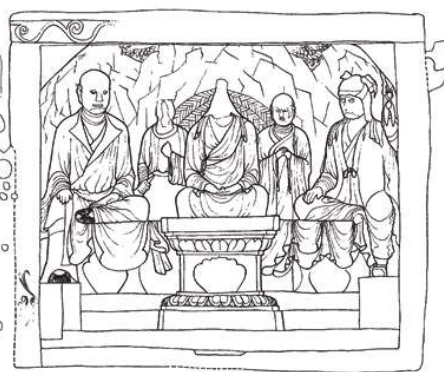


圖8 唐末至五代，僧伽、萬迴、寶志三高僧合龕線描圖。⁴¹

此外，四川地區石窟僧伽造像與夾江千佛崖91龕唐末五代的人物組合方式與造形特徵基本相同的還有大足北山佛灣177窟。此為北宋靖康元年（1126）雕刻。保存較好，圖像清晰，可供參考，因加介紹如下：

³⁹ 重慶市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安岳縣文物局，〈四川省安岳縣西禪寺石窟調查簡報〉，《藝術史研究》，輯10，（2008）。

⁴⁰ 于春，〈四川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3期（2014），頁85-96。

⁴¹ 肥田路美著，臧衛軍譯，〈夾江千佛岩091號三聖僧龕研究〉，《四川文物》，4期（2014），頁73-82。

此僧伽窟為平頂窟，中壁刻僧伽像，盤膝而坐，首戴披風，背有椅靠，前為三腳夾軾。兩旁侍者，一執淨瓶者當為僧伽弟子慧儼或慧岸、一執錫杖（木叉）。左一像戴披風，垂足而坐，左手持杖，杖上掛有剪刀、拂子等物，當是蕭梁時的高僧寶志和尚；右一像是萬迴，光頭垂足而坐，頭戴風帽，頭部微頷，緊眉低目，張口未合，神態癡呆而微苦，具有「生而愚」的相貌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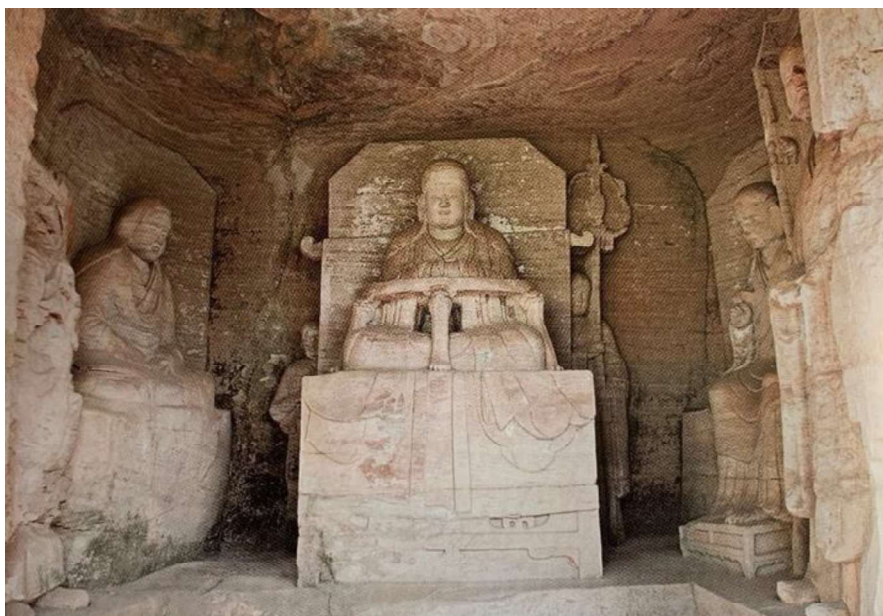


圖9 大足石窟北山第177窟。



圖10 左壁志公。



圖11 右壁萬迴。

此外，1986夏，陝西淳化縣（今寶雞）固賢鄉丁村河出土李敬周造僧伽像。石像砂石質。通高93公分，肩寬33公分。披僧衣，頭戴兜風。兜風項為星光四射形，帶結腦後，下垂於背，兩手作吉祥印，結跏趺坐。長方體座，寬50公分，高21.5公分。方形台座正面題記陰刻13行，行4至11字，題記文字多剝蝕。其文可辨識為：

維清泰三年歲次丙卯九月丁□□二十七癸□李敬周為闔家大小平善敬造軀及侍者
□□□□□□□□佛□□弟子一心供養弟子□□□□□□□男行□□□□□孫
□義□可憐憎□女□黨敬思□□□女弟子□氏□□張氏女子李氏女子李氏。

按：「清泰」是五代後唐末帝李從珂的年號，清泰三年為西元936年。與該造像一組同出兩件袖手立像，頭部缺失，據題記判斷應為僧伽「侍者」。

陸、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信仰的發展

一、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信仰圈的形成

僧伽和尚是初唐西域入華的傳奇人物，他以一介胡僧，神通初露，漸成道行超凡的高僧，進而由一名高僧成為迭現靈異的觀音化身，因而深受士大夫推崇、皇帝的封贈、民眾的崇信的神僧，更演變成護佑多方的聖僧，信徒眾多，香火不絕。其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的生命歷程中，為民消災解難、救治疾病、祈雨抗旱、化身現形、預測吉凶，大慈大悲，有求必應。因此得以從入華僧人到泗州和尚，再到「泗州大聖」、「聖者泗州和尚」，甚至被視為「泗州佛」；成為廣大信眾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僧伽造像遂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從唐五代，歷經兩宋、元明的發展，神異傳說不斷地層層疊加，促使其信仰崇拜從淮水下游逐漸遍及東南沿海，乃至擴大全國各省。信仰區域不斷擴大，最終成為中國民間擁有廣大信仰圈的僧伽信仰。

唐中宗景龍四年僧伽示寂，李邕《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載：「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漆色身。」「攀係儀形，建崇塔院，植婆羅樹，表蓮花台」，李邕「普光王寺碑」中提及：「申弟子之禮……敬漆色身」，「植婆羅樹，表蓮花台」，「宛然坐而不言」。《太平廣記》中記載於薦福寺塑身起塔。贊寧《宋高僧傳》中載：「令寫貌入內供養」，「燕使齎所求物到，認塔中形信矣」，「遂圖貌而歸，自燕薊輾轉傳寫，無不遍焉」。

敦煌寫本 S.1624《唐泗州僧伽大師寔錄（鈔）》云：「大師年八十三，暮春三月入滅。萬乘輟朝，兆民罷業。帝令漆身起塔。」贊寧《宋高僧傳》：「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曰大聖僧伽和尚。」足見唐五代為僧伽和尚修建塔院、造像、描真、繪像相當風行，展現僧伽和尚信仰的普遍。

據學者統計，迄今發現唐五代至明清時期的泗州寺院有96處，其中供奉有僧伽像的有25處；文獻中記載有僧伽像的有20處，傳世或學者新考證有關的僧伽像有27處、29件。⁴²

除了單體僧伽像外，還有僧伽、寶志、萬迴三者合龕造像，僧伽變相，以及僧伽、弟子、供養人合龕像等；其時間從晚唐五代、兩宋時期到元明清；流布的空間，從臨淮泗州輻射到西北的敦煌，西南之四川，中原的長安，北方的燕薊以及東南的江、浙，幾乎遍及全國各地。

僧伽信仰初期的唐五代，有關各地泗州僧伽和尚寺、堂、塔院、像等遺跡，茲據牧田諦亮、⁴³林曉君、⁴⁴牛長立等的統計及有關的考察研究，梳理條列如下：

（一）僧伽寺四處

- 1.吳江縣蘆墟內有泗州寺。見《江南通志》卷44記載，位於吳江縣蘆墟內的泗州寺創建於景龍二年。
- 2.湖南醴陵泗州寺（唐代創建，明洪武重修）。
- 3.湖北雲夢縣泗州寺（相傳系唐代創建）。
- 4.寧波天封院（唐通天登封年間，696-697）。⁴⁵

⁴² 牛長立，〈論古代泗州僧伽像僧、佛、俗神的演化進程〉，《宗教學研究》，2期（2016），頁102-116。主要據林曉君，《泗州佛信仰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的統計資料，再行增補。

⁴³ 牧田諦亮，〈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過程泗州大聖僧伽和尚について〉。後改題〈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過程〉，收入《中國佛教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第2-3章，頁28-84。

⁴⁴ 林曉君，《泗州佛信仰研究》，頁31。列舉了8處：寧波天封院（唐通天登封年間，696-697）、江蘇吳江泗州寺（唐景龍二年）、寧波太平興國寺有泗州像（唐開元二十八年，740）、湖南醴陵泗州寺（唐代創建，明洪武重修）、福建長樂泗州院（唐大中六年，852）、湖北雲夢縣泗州寺（相傳系唐代創建）、寧波方廣教寺（唐咸通十一年，870）、廈門南普陀寺（始建於唐代）。

⁴⁵ （元）袁桷等撰，（延佑）《四明志》，卷16，「釋道考上·昌國州·在城甲乙教院·天封院」，《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57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20。

（二）僧伽堂二處

- 1.登州開元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2載：「此開元寺佛殿西廊外，僧伽和尚堂內北壁上，畫西方淨土及補陀落淨土，是日本國使之願。」⁴⁶
- 2.成都大慈寺南畔：《舊唐書》中記載。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成都大慈寺南畔建立了僧伽和尚堂，畫家辛澄偶得胡本，畫僧伽及諸變相，隨後各代都有增飾。
《舊唐書》載有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成都大聖慈寺僧伽和尚堂。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2載，成都大慈寺（亦有作「大悲寺」）泗州堂有僧伽像，普賢閣下有五如來像。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上「辛澄」條亦載有此事，⁴⁷又「常重胤」（唐僖宗年間之人，871-888）條下云「……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張居士真、寶曆寺請塔天王、甯蜀寺都官土地，並重胤筆，見存。」

（三）泗州院、塔院六處

- 1.浙江寧波府方廣教寺：《雍正寧波府志》卷33記載，位於浙江寧波府西南三十五里的方廣教寺，原名泗州院，創建於西元870年。⁴⁸
- 2.廈門五老山的南普陀寺：《廈門南普陀寺志》記載，位於廈門五老山的南普陀寺為五代僧人清浩創建，初名泗州院。
- 3.福建長樂泗州院（唐大中六年，852）。
- 4.懷安縣：閩天成元年（927）在懷安縣置泗州院。
- 5.南唐後主將淨相院改為泗州塔院。
- 6.荊南天福三年（938年）修建僧伽妙應塔。

（四）僧伽像五處

- 1.寧波太平興國寺：寺有泗州像，長尺餘。先是於福名橋水中時見光景，入木得之，因加嚴飾，崇奉於寺。⁴⁹

⁴⁶ 小野勝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修訂校注，周一良審閱，釋圓仁原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頁224。

⁴⁷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上，「辛澄」條：「辛澄者，不知何許人也。建中元年，大聖慈寺南畔創立僧伽和尚堂，請澄畫焉。……胡人言僕有泗州真本。一見甚奇，遂依樣描寫，及諸變相。未畢，蜀城士女瞻仰儀容者側足；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真，華亭張居士真，寶曆寺請塔天王，甯蜀寺都官土聖一堵，常祭筆……慧日院，門壁畫奉聖國師真、齊天大王、泗州和尚，宗震筆……華嚴閣，『泗州和尚』小壁。」

⁴⁸ （元）袁桷等撰，（延佑）《四明志》，卷17，「釋道考中·鄞縣甲乙院·方廣寺」，載《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57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14。

2. 寧波天封塔內「天封塔地宮殿」模型西次間也是種縮微的僧伽影堂。
3. 長安：招福寺、興善寺、青龍寺。
4. 長安：段成式《酉陽雜俎》卷6記錄了睿宗聖容院西南角僧伽像。
5. 潤州甘露寺：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3《記兩京外州寺觀壁畫》（東都寺觀附錄）載，宰相李德裕鎮浙西，創立甘露寺，唯該寺不曾在會昌五年滅法中為武宗所毀，取管內諸寺畫壁置於寺內，吳道子鬼神及王陀子須彌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以下我們從傳世文獻載籍、敦煌寫本文獻記述及各地區有關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的寺、堂、造像、經變等遺跡，參考前賢調查研究的成果，標誌製作示意圖，藉以展示唐五代泗州僧伽和尚的信仰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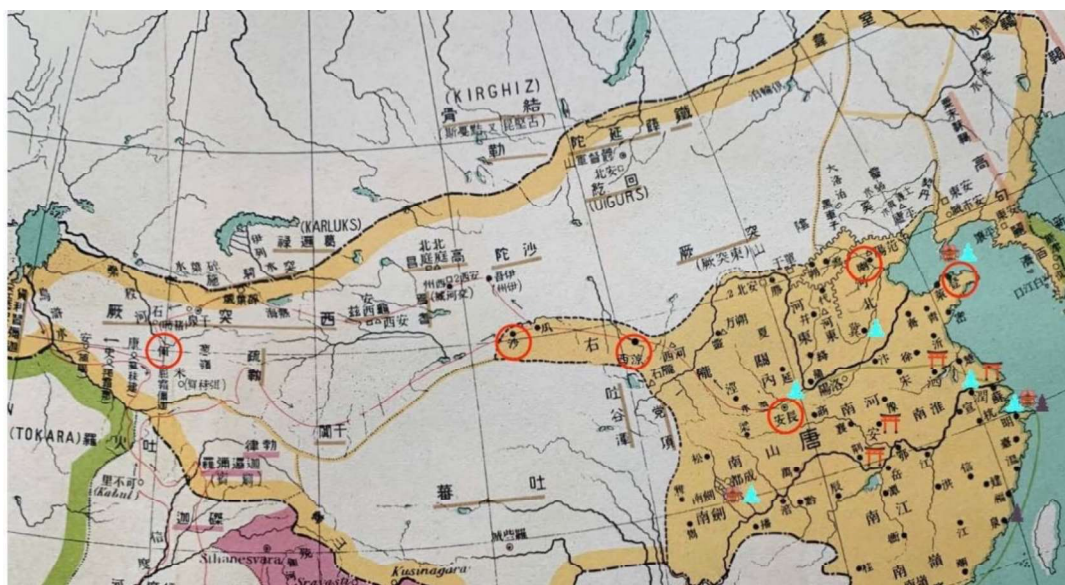


圖 12 ○ 代表僧伽活動史蹟
 代表僧伽塔院
 代表有僧伽寺
 代表僧伽堂
 代表僧伽像

粟特人的僧伽和尚，出生於西域蔥嶺北的何國（屈霜儸迦），從小出家，有志周遊四方，三十歲時入華，經河西初到西涼府（今甘肅武威），後遊歷於江淮一帶。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寄居山陽龍興寺，初露神異。同年到泗州臨淮縣（今江蘇省盱眙縣）置普照王寺弘法佈道，名聲遠播，深受百姓崇敬，以至造寺供奉；龍朔二年

⁴⁹ (元)袁桷等撰，(延佑)《四明志》，卷16，「釋道考上·昌國州·在城教院·太平興國寺」，《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57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頁16。

(662)，僧伽應召入京，中宗封為國師，並敕泗州寺為「普光王寺」；景龍四年僧伽八十三歲圓寂於長安薦福寺。中宗為其敬漆肉身，送回泗州臨淮起塔供養，奉為「泗州大聖」。後世更是信仰崇奉，香火不斷。全國各省州縣多有僧伽的塔、寺、堂、像等修建營造繪製，又在唐五代到宋元以來居士佛教的推動下，僧伽信仰更加傳播，從以上的梳理，大致約略可見唐五代時期中國民間信仰特殊的泗州僧伽和尚信仰圈已然形成。

二、觀音化身與僧伽信仰的發展

何以僧伽和尚以一介粟特僧人，入華佈道，能為高僧、泗州和尚、泗州大師、泗州大聖，稱為泗州文佛，而形成廣大的信仰圈呢？有關此一發展形成的原因，自來學界頗多探究，除了以期精通醫藥、卜兆，多顯神通，治病救人，出民水火，利益眾生之外，僧伽和尚以觀音化身示現當是最為主要的原因之一。然而歷來僧人藉助觀音示化以弘法傳教者甚多，何以僧伽和尚得以成就，其中緣由值得深究。

觀音菩薩是早期印度大乘佛教菩薩信仰的代表，是中國四大菩薩之一。據《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的記述，當眾生遭遇困難時，只要誦念觀世音名號，觀世音菩薩會即時觀其音聲，前往拯救。隨著佛教的東傳，觀世音菩薩以其完美的慈悲化身，成為中國佛教的主要信仰，是所有菩薩信仰中最具影響力者，故而有所謂「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的稱法。同時，也廣泛的流傳至中國周邊的國家，使觀音信仰成為半個亞洲的信仰。

觀世音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形象，從三世紀末在中土即深受廣大人民的信仰。魏晉南北朝時，觀世音信仰就已在民間廣泛流行。它的主旨乃在於宣揚解脫、救濟的觀念。體現的是現世救濟，尤其拔苦與樂，解脫水火刀兵之災等。隨著觀音信仰的發展，產生了許許多多不同形態的觀世音，儘管形態千差萬別，然救苦救難的根本精神始終一致。同時有關觀世音的各種神變、靈異傳說故事更隨著不同的時空環境，不同的信眾階層，不斷的滋生衍化。

觀世音信仰在歷史發展中，經歷了不同的演變過程。在南北朝分裂動亂的時代，人們信仰的主要是《法華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主要因南北朝時代苦難深

重，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不期望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南北朝後期，隨著淨土信仰開始流傳，淨土觀音也隨之被重視起來。

此外，中土早已流傳不少古密教的觀音咒，加上持明密教傳入，到唐代初期，印度新興起的瑜珈密教的輸入，大悲觀音以及其它一批密教變形觀音隨之流行起來，密教變形觀音的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以其奇特瑰麗的面貌又很符合當時人的浪漫的藝術趣味，而無比神奇的威力和靈跡也適應當時人追求超越、嚮往靈異的心理。具有密教形象的觀世音廣受崇奉。其中最流行的有對千手千眼觀音、如意輪觀音、十一面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大悲觀音等隨之流行起來。《大悲經》、《大悲咒》更是風靡各界。

《普門品》所表現的觀音信仰內容主要有三，其一是普門救濟，即普遍的救濟。《普門品》中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一心稱名以求解脫，顯然已有運用咒語的意味。

其二是拔苦濟難的簡易與方便。《普門品》中提出稱名可以濟：水、火、羅刹、刀杖、惡鬼、枷鎖、怨賊七難；念觀音可以離：貪、瞋、癡三毒；禮拜觀音則滿二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具有稱名救濟的現世利益。

其三是化身示現，即觀世音施設方便，以三十三化身為眾生說法。這三十三化身是：佛、闍支佛、聲聞、梵王、帝釋、自在天、大自在天十天大將軍、毗沙門、小王、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長者婦女、居士婦女、宰官婦女、婆羅門婦女、童男、童女、天身、龍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羅身、迦樓羅身、緊那羅身、摩睺羅伽、執金剛神等。這充分顯示了觀音的神變與方便。

漢譯佛典中，與觀音有關係的大乘顯密經，多達八十種，其中最重要的是《法華經》、《華嚴經》、《心經》、《楞嚴經》、《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十一面神咒心經》、《不空羂索咒心經》等等，同時還有不少有觀世音的疑偽經，如後世盛行的《觀世音三昧經》及《高王觀世音經》等。⁵⁰「偽經」主要是以廣大民眾為訴求對象，因此更能順應人們的要求，也

⁵⁰ 藍吉富編，〈典籍篇〉，《觀世音菩薩聖德新編》（新北：迦陵出版社，1995）。

更能反映他們的心理。透過這些偽經使觀音信仰更加的普及和深入，另一方面顯示佛教的中國化與世俗化。

觀音示現與觀音化身是大乘佛教化身觀念的具體發揮，充分顯示了觀音的神變與方便。實際上三十三身只是列舉出的例子。真實的意義在觀音可以化身為各種各樣的「人物」，任意地出入世間，發揮救濟的功能。

中國佛教的傳播過程中，以觀音化身示現尤其深受廣大信眾的崇敬，蕭梁時期的寶誌，初唐的泗州和尚僧伽，乃至虢州閭鄉萬迴。其中僧伽和尚最為稱著。一方面是僧伽和尚現世救濟，拔苦與樂，解脫人們的水火刀兵之災等等事蹟，呼應了唐宋以來中土人士的意識，滿足了人們超離苦難現實的要求。再者，僧伽除了繼承觀音信仰既有的思想之外，特別是唐密的盛行，引入了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展現無量的神變和靈異。

十一面觀音，又稱十一面菩薩、大光普照觀音。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之一。在中國有關十一面觀音的經典有四種譯本，分別是：

- (一)《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北周耶舍崛多與闍那崛多共譯（約570）。
- (二)《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高宗永徽四年（653-654）阿地瞿多譯。
- (三)《十一面神咒心經》：顯慶元年（656）唐玄奘（602-664）譯。
- (四)《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天寶年間（746-774）不空（705-774）譯。

以上四部有關十一面觀音的經典，內容均強調持誦此經有：1.身常無病、2.為十方諸佛憶念、3.財物飲食充足、4.破一切怨敵、5.使眾生生慈心、6.蠱毒熱病不能侵、7.刀杖不能害、8.水難不能漂、9.火難不能焚、10.不受橫死等十種功德；以及臨命終時見十方無量諸佛、永不墮地獄、不為一切禽獸所害、命終後生無量國等四種果報。

唐代淨土觀音信仰發展到鼎盛階段，我們從敦煌壁畫描繪無數燦爛輝煌的「淨土變」，可以獲得佐證。這反映了人們對來世救濟和理想生活的嚮往，觀音在其中是個主要角色。密教系統的菩薩像以觀音為最早，而變化觀音中又以十一面觀音的經典及造像最早出現，七世紀末到八世紀初葉十一面觀音像大量出現，根據彭金章《敦煌石

窟隋至元密教疑迹種類與數量統計表》所顯示，敦煌石窟壁畫十一面觀音（經變）計有34幅，初唐7幅，盛唐1幅、中唐3幅、晚唐8幅、五代9幅、宋初2幅、西夏4幅。⁵¹

漢傳密教初創的唐朝前期是密教十一面觀音信仰發展的初期，正是僧伽入華佈教的時代，其時十一面觀音受到當時統治者的重視，如契丹首領李盡忠叛亂時，賢首國師法藏（643-712）奉武則天之命，奔赴幽州，便是以十一面觀音法破敵。而安史之亂時，十一面觀世音化身的僧伽信仰，在幽州地區一度風靡。⁵²從中可窺知僧伽和尚的信仰與密教十一面觀音的流行具有一定關係。

三、僧伽、寶誌、萬迴三僧合龕崇拜的發展

寶誌為南朝宋梁高僧，僧伽、萬迴同為唐朝前期的高僧，晚唐五代宋初四川各地石窟有關僧伽造像眾多，除了僧伽和尚的單體造像外，也出現有僧伽和尚變相及僧伽、寶誌、萬迴三聖同窟的造像。顯示唐五代宋初僧伽、寶誌、萬迴三僧崇拜，且有結合一起，反映了三聖合龕共祀信仰的發展。

不僅是四川石窟，敦煌石窟壁畫與藏經洞寫本文獻的資料也顯示出僧伽、寶誌、萬迴三僧崇拜的訊息。敦煌文獻保存有 P.3727《泗州僧伽和尚因緣記》及 S.1624《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唐虢州萬迴和尚傳（鈔）》、《三寶感通錄·宋寶誌傳（鈔）》匯抄外，敦煌石窟也保存有僧伽、寶誌、萬迴的畫像資料。日本入唐求法高僧圓仁（794-864）在《入唐新求聖教目錄》中也著錄有：「壇龕僧伽、誌公、萬迴三聖像一合」後並標明：「右件法門佛像道具等，於長安城興善、青龍及諸寺求得者，謹具錄如前。」顯示中唐時都城長安僧伽、寶誌、萬迴三聖僧合一已時有所見。

四川夾江千佛崖第91號窟刻有僧伽、萬迴、寶誌三高僧合龕像，⁵³乃至大足北山佛灣177窟僧伽、萬迴、寶誌三高僧合龕像的實體材料等，意味著寶誌、僧伽、萬迴三位高僧均以能自顯神通，治病禳災，度化眾生聞名，並且均以觀音化身、示現等神異事跡，獲得帝王及士人及庶民的崇信。從現存的文獻與考古資料，不難看出已經顯露出晚唐五代宋初的長安、四川、敦煌等地，民間已有共同崇拜三聖僧信仰的端倪。

⁵¹ 彭金章，《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頁251。

⁵² 尤李，《唐代幽州地區的佛教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118。

⁵³ 詳參肥田路美，〈四川省夾江千佛岩の僧伽・寶誌・萬迴三聖龕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3分冊，輯58，（2013），頁51-67。另有中譯本，見肥田路美著，臧衛軍譯，〈夾江千佛岩091號三聖僧龕研究〉，頁73-82。

敦煌寫本 P.3727《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記》及 S.1624《泗州僧伽大師實錄》（鈔）、《唐虢州萬迴和尚傳》（鈔）、《三寶感應錄·宋寶誌傳》（鈔）的匯抄，莫高窟五代第395窟有寶誌和尚像。張小剛《敦煌佛感通畫研究》著錄：「莫高窟395窟甬道南壁朝是歸義軍前期畫一僧人像，像已殘。現存山巒與一鹿。並云：二十世紀初法國伯希和考察對曾拍攝該畫像。」見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⁵⁴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記載此處有漢文題記：「蕭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和尚以偈答。」可能是此僧人像的榜題。

另外，P.3490《諸雜齋文》中有：「弟子歸義軍節度押衙知當州左馬部都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察御使李神好，奉為國界安寧，人民樂業。府主使君長延寶位，次為己躬吉慶，障沴不侵，合家康寧，所求得遂。敬繪萬迴大師，願垂悲聖力，救護蒼生，一心供養。」敦煌石窟中雖未見有萬迴大師像遺存，但從此篇供養文可推知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有繪製萬迴大師畫像供養禮拜的實情，只是實體沒有保留下來。今存敦煌石窟壁畫也未見有僧伽、萬迴、寶誌三高僧合龕畫像的發現，但從敦煌文獻所載，及敦煌石窟存在有僧伽、萬迴、寶誌三高僧分別繪製畫像情形存在的可能，顯示三位高僧已是敦煌地區信眾們共同崇拜的對象，三聖合龕存在的推測未必成立，但三聖共同禮拜的發展趨勢似已隱然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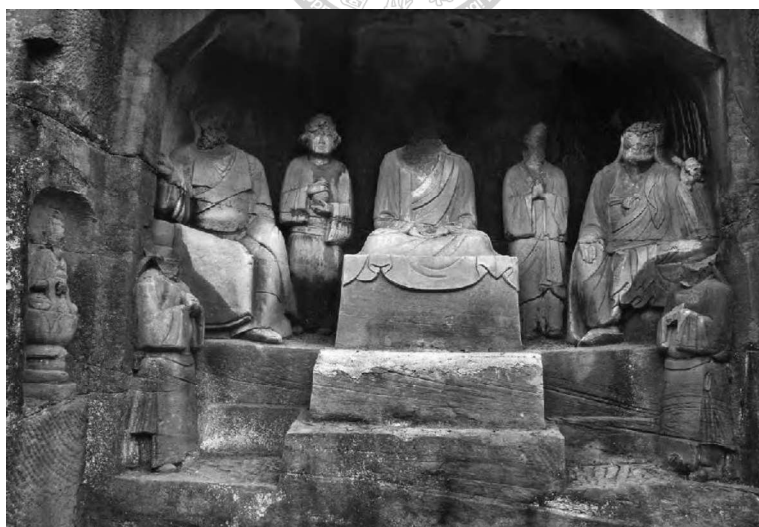


圖13 四川綿陽北山院11號龕。

⁵⁴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第6冊，圖版 PL.CCCXXXIII。

三位神異僧人以僧伽為主尊並列的形式，除夾江千佛岩091龕、北山大佛灣177窟外，還有四川綿陽魏城鎮北山院石窟第11號龕（圖13）。此龕中尊的脅侍、龕口內站立俗像以及龕內構圖形式都酷似夾江千佛岩091龕，比較明顯的差別是左右兩尊下垂的足是內側而不是外側。此龕學者有以為是晚唐九世紀末期的作品。當然亦應被看作三聖僧組合的代表作。⁵⁵宋明代塑像、石刻大多以僧伽為主尊，左右脅侍為弟子分別慧儼、慧岸、木叉中的兩位形成僧伽三尊的組合呈現。

敦煌文獻各寫本所記僧伽、萬迴、寶誌三位和尚的神異事跡，展現大抵均屬神通：或為化身，或為變物，均突顯三位和尚以異跡化人、以神力救物。寶誌固然以此獲得梁武帝的崇敬信任，僧伽、萬迴也是藉此得到唐中宗的仰慕崇重。



⁵⁵ 于春、王婷，《綿陽龕窟——四川綿陽古代造像調查研究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11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宋）李昉等編，《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
-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元）袁桷等撰，（延佑）《四明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577》，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二）近代論著

- 于春、王婷，《綿陽龕窟——四川綿陽古代造像調查研究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 小野勝年校注，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修訂校注，周一良審閱，釋圓仁原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河北：花山文藝出版社，2007。
- 尤李，《唐代幽州地區的佛教與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 安旗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2。
- 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彭金章，《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
-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 藍吉富編，《觀世音菩薩聖德新編》，新北：迦陵出版社，1995。
- 矢吹慶輝，《鳴沙遺韻解說》，東京：岩波書店，1933。
- 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第6冊，圖版 PL.CCCXXXIII。

（三）期刊論文

- 于春，〈四川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3期（2014），頁85-96。
- 牛長立，〈論古代泗州僧伽像僧、佛、俗神的演化進程〉，《宗教學研究》，2期

(2016)，頁 102-116。

王惠民，〈敦煌壁畫〈十六羅漢圖〉榜題研究〉，《敦煌研究》，1期（1993），頁 25-36。

李小強、鄧啟英，〈成渝地區中東部僧伽變相初步考察及探略〉，《石窟寺研究》，2期（2011），頁237-249。

肥田路美著，臧衛軍譯，〈夾江千佛岩 091 號三聖僧龕研究〉，《四川文物》，4期（2014），頁 73-82。

重慶市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安岳縣文物局，〈四川省安岳縣西禪寺石窟調查簡報〉，《藝術史研究》，輯10（2008），頁529-553。

孫曉崗，〈僧伽和尚像及遺書《僧伽欲入涅槃說六度經》有關問題考〉，《西北民族研究》，2期（1998），頁261-269。

孫應傑，〈僧伽生平和僧伽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1期（2017），頁86-93。

馬世長，〈泗州和尚、三聖像與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圖〉，《藝術史研究》，輯11，（2009），頁273-328。

高秀軍、李向東，〈新發現資中月仙洞兩龕僧伽變相初考〉，《敦煌研究》，2期（2016），頁46-54。

楊明璋，〈泗州僧伽和尚神異傳說研究——以敦煌文獻為中心的討論〉，《中國學術年刊》，39期（2017），頁51-76。

鄭式，〈佛裝與佛化——中古時期泗州僧伽信仰與圖像的在地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2016），頁71-97。

羅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經像與泗州和尚信仰〉，《美術研究》，1期（1993），頁 64-68。

牧田諦亮，〈中國に於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過程泗州大聖僧伽和尚について〉，《東方學報》，冊25（1954），頁264-286。

肥田路美，〈四川省夾江千佛岩の僧伽・寶誌・萬迴三聖龕について〉，《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第3分冊，輯58（2013），頁51-67。

（四）專書論文

姚崇新，〈四川安岳西禪寺石窟僧伽三十二化變相及相關問題〉，收入姚崇新，
《觀音與神僧：中古宗教藝術與西域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374-
416。

（五）學位論文

林曉君，《泗州佛信仰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六）網路資料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41（CBETA，T49，no.2035，p.0380c13）
http://tripitaka.cbeta.org/T49n2035_041，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宋）道原撰，《景德傳燈錄》，卷27（CBETA，T51，no.2076，p.433，a4-b10）
http://tripitaka.cbeta.org/T51n2076_027，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大正新脩大藏經》<http://buddhism.lib.ntu.edu.tw/DLMBS/sutra/chinese/index.jsp>，檢
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王惠民，〈僧伽研究論著目錄〉，《敦煌研究院：敦煌學研究》

<http://public.dha.ac.cn/content.aspx?id=149132737013>，檢索日期：2020年8月12日。

